

「活人」辦報及其歷史書寫

——評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

• 卞冬磊



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中國新聞（報刊）史研究，雖有歷史之名，卻往往只扮演着歷史學的「遠親」角色。一般而言，它的造訪者來自新聞學科內部，少有歷史學家長久駐扎此地。此種狀況自然為有心人不滿。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李金銓教授主編的《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以下簡稱《報人報國》，引用只註頁碼）一書，即是對新聞史研究的這種故步自封狀態的自我反思。

中國新聞（報刊）史研究，雖有歷史之名，卻往往只扮演着歷史學的「遠親」角色。此種狀況自然為有心人不滿。李金銓教授主編的《報人報國》，即是對新聞史研究的這種故步自封狀態的自我反思。

一 「門」：中國新聞史的「劃界」與「邀請」

「中國新聞（報刊）史」作為研究領域的確立，與近代中國新聞職業、新聞教育專門化之進程如影隨

* 本文為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閱讀公眾的興起：晚清報刊閱讀史研究（1894-1911）」（專案編號：13YJC860003）研究成果之一。

新聞史須首先確立起「本體意識」，其根源是要糾偏1949年以來中國新聞史依附於政治史的敘述邏輯。《報人報國》一書就是「新聞史」這個「有限單元」，站在報刊的門檻上，對「歷史學」這一「無限空間」發出的邀請。

形。早在1901年，梁啟超就在《清議報》第一百冊撰文，回溯「中國報館之沿革」^①；1908年，章士釗出版《蘇報案紀事》，成為「我國最早的報紙個案史著作」^②。這些細小的支流，終於在五四前後匯聚為一個蔚然可觀的領域。1917年，姚公鶴在《上海閒話》一書之附錄，刊出《上海報紙小史》；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宣告成立；1919年，徐寶璜的「破天荒之作」《新聞學》誕生；1921年，上海聖約翰大學開辦中國乃至亞洲第一個報學系；隨後，邵飄萍、任白濤、蔣國珍分別推出《實際應用新聞學》、《應用新聞學》、《中國新聞發達史》，這些書「第一次觸及和研究中國報刊的職業化問題，並形成了中國新聞思想史上第一個關於新聞職業化的思潮」^③。此後，戈公振1927年出版的《中國報學史》，公認是「中國新聞史的奠基之作」，其對於「報學史」的界定，至今鮮活：「用歷史的眼光，研究關於報紙自身發達之經



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是中國新聞史的奠基之作

歷，及其對於社會文化之影響之學問也。」^④

自此，「新聞史」安居於新聞學科內，目睹國家政權更迭和政治變幻、新聞有學無學之論爭、新聞內涵向傳播之擴展，巋然不動，它似乎因「背靠歷史學科這一棵大樹」，而得以「悠悠然隔岸觀火」^⑤。然而近年來，「新聞史」忽然意識到，大學新聞學院已被電視、網絡、微博、廣告、輿論等一眾「喜新厭舊」的傳播事物佔領，新聞史研究只剩下儀式化的尊嚴，「像過去宗祠裏的祖先牌位，逢年過節的時候受受朝拜，平時則冷冷清清，寂寂寥寥」^⑥；轉而，當它眼光向外，試圖尋求另一個主人「歷史學」的認同時，又發現自己「坐井觀天」久矣，已被落下太多距離。

如是，關於自身存在的危機以及相伴而來的反思意識，在新聞史研究中逐漸蔓延開來：如何從革命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依附中走出來？如何掙脫編年史的思維方式？如何拓展研究的新視角和新風格？這些問題被競相提出，其結果是，一個廣泛的共識建立起來：新聞史須首先確立起「本體意識」^⑦，以報刊自身為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揭示的是「報刊的歷史」，而非「歷史的報刊」^⑧。

尋找失落的「本體意識」，其根源是要糾偏1949年以來中國新聞史依附於政治史的敘述邏輯；尋求「本體」，同時也是一種「劃界」行為。當個人急切地希望尋找立足之地時，固然是無可奈何的策略，卻也可能是確立自我、超越界限、走向對話的前奏。「新聞史」的「劃界」

行為實具有齊美爾 (Georg Simmel) 所說的「門」之意義^⑨：

我們所追求的有限總是局限於任意一點有形的或先驗存在的無限之中。因此，門就成為人們本應或可以長久站立的交界點。茅屋是有限單元，是人在無限空間中為自己選定的一點，門將有限單元和無限空間聯繫起來，通過門，有界的和無界的相互交界……

《報人報國》一書就是「新聞史」這個「有限單元」，站在報刊的門檻上，對「歷史學」這一「無限空間」發出的邀請。本書由李金銓牽頭，約請十數位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日本和美國的歷史、新聞學者，圍繞「自由主義與報刊」這一寬泛的議題，自由發揮，互相交錯，形成了包括序言、附錄在內的十五篇佳作。

1957年，毛澤東批評《人民日報》是「無動於衷」的「死人辦報」^⑩，長官意志盡顯。然而，報人實非毫無生命的動物，他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擁有自己的處事邏輯。本書最大的特色，乃是有相當的篇幅關懷報刊背後形形色色的人物，呈現了「報人／知識份子」與時代相遇時和政治的抗爭、多歧的思想，以及豐富的心靈。概言之，諸位作者所呈現的恰恰是「活人」辦報的歷史。

二 「活人」辦報：對政治的拒絕、妥協與順從

美國媒介社會學家凱里 (James W. Carey) 說：「每個政治概念和實踐

同時是新聞事業的概念，每種新聞事業的概念同時也是政治概念。」^⑪換言之，無論在何種體制下，新聞從來都與政治緊密相關，相互依戀。但新聞終究不是政治，它有自己的職業意識形態，如論者所言，「是不同於市場與政治的第三種邏輯」^⑫。因此，黃旦教授和周葉飛博士在《報人報國》一書中指出：「〔新聞〕專業主義有自身凝望的絕對主體，藉此知識份子有了立足社會的基點，同時也具有了反思批判並與政治和商業話語抗衡的資源。」(頁347-48)

新聞史理所當然地抓緊這個「本體」，小心翼翼地處理它與政治的緊張關係。在書中，陳建華教授以「對於國共來說，不是覺得無關宏旨，便是恍如隔世」、因而「久不見新聞史」(頁251-52)的報人陳冷為例，試圖透過他的職業生涯，解開一個「迷思」，即「像『自由』、『獨立』一類的抽象概念」，如何體現於近代中國報刊的具體實踐之中(頁222-23)。陳建華發現，1904年後陳冷主掌《時報》時，與同仁竭力塑造《時報》的自我身份，並未全然隨「立憲派」唱和；在新聞實踐中，無論在《時報》還是1912年後加入《申報》，陳冷均以撰寫「時評」為主要志業，他的文章「以新聞為依據，故言之有物，與『民意』感同身受，故殊具時效」；「以開拓『社會』空間為標的，與政府當局、黨派及集團利益之間保持距離，且具批評的姿態，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自由獨立之精神』」(頁244)。1930年，隨着「蔣時代」的來臨，陳冷沒有像陳布雷、張季鸞等報人那樣，與蔣介石走得太近，而是「敢於說『不』」。

《報人報國》關懷報刊背後形形色色的人物，呈現了「報人／知識份子」與時代相遇時和政治的抗爭、多歧的思想、豐富的心靈。概言之，諸位作者所呈現的恰恰是「活人」辦報的歷史。

陳建華高度讚揚陳冷，在事業高峰之際激流勇退固然可惜，卻難能可貴地實現了新聞專業及其人格的「完整性」(頁249)。

然而，像陳冷這樣的報人，在新聞史上寥若晨星。報人在面對民族危機、救亡圖存或強權政治時，往往主動或被動地選擇犧牲新聞邏輯。正如李金銓所說，媒介和權力的探戈舞，「領舞的總是權力結構」；「權力結構是首要的現實界定者，是第一性，而媒介是次要的現實界定者，是第二性」(頁403)。此語所指之報人對政治的妥協與順從現象，在近代中國俯拾皆是。

來自美國的張詠教授，在書中反思了一個「局內人」不大去考量的議題，即民族主義與新聞自由的緊張關係。1919年至抗戰期間，從英美回國、接受自由主義教育的知識人，竟發展出「內外有別」的新聞觀念，他們要求政府對外國報紙進行審查，因而，「在西方被認為對立的新聞自由和新聞檢查，在現代中國『救亡圖存』的宏大敘事中結合為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新聞主張」(頁285)。張詠指出，中國知識份子以「真相」、「國家主權」和「民族危機」為由，為新聞檢查的正當性辯護，體現了一種「弱勢民族主義」的心態，此種心態讓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將新聞檢查看作「糾偏機制」，用以「遏制西方的偏見報導，讓西方輿論了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真相」(頁301)。

同樣，來自日本的「局外人」孫江教授，雖主要描寫《京津日日新聞》主筆橘樸和魯迅在1920年代的交往關係，而顯得與本書主題頗為

疏遠，但其文側面也透露出這份日本報紙「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批判」。橘樸對報紙「不受階級和黨派左右」的聲稱以及對中國的報導實踐(頁263-64)，一定程度顯現了新聞邏輯和民族主義的衝突。

與「民族主義」相比，新聞專業在更強勁的對手「一元政黨政治」面前，顯得更加脆弱。中國報人對政治的抗爭、妥協與順從，在中共黨報模式形成之後，便貫穿了整個新聞實踐。在書中，黃旦延續對延安《解放日報》從「不完全黨報」到「完全黨報」的思索^③，將眼光轉向記者之「主體」，探討他們從「新聞專業」向「政治宣傳」的蛻變。他和周葉飛撰文指出，那些懷揣着民主、個性解放，具有浪漫情懷的知識青年，經歷了一個「把自己拆散，然後再根據文件把自己重新建造起來」(頁347)的過程：首先，「驅除『無冕之王』，明確是『黨的』喉舌、耳目和眼睛」；其次，「改變報導重點，從一般意義上的『新聞』轉到以宣傳和推動黨的實際工作為主」；最後，「放下記者架子，走出編輯部與黨組織和工農通訊員共同辦報」(頁346)。

與黃、周二人的文章交相輝映的是楊奎松教授對建國前後《大公報》主筆王芸生「主體重建」過程的探索。近年來，1949年以後的歷史漸成研究熱點，其中政權更迭引發的種種變化，尤令人矚目。對新聞史而言，「民間報人」變成「黨的幹部」^④，「私營報館」成為「國有資產」，均是十分引人入勝的議題。可楊奎松感慨：「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新聞史著作深入考察過……新政權破舊立新，成功施行新聞統制

像陳冷這樣的報人，在新聞史上寥若晨星。報人在面對民族危機、救亡圖存或強權政治時，往往主動或被動地選擇犧牲新聞邏輯。李金銓說，媒介和權力的探戈舞，「領舞的總是權力結構」。

政策的具體經過。」(頁356)因此，他以歷史學家的方式，跨進新聞史之「門」，運用許多第一手檔案，還原了王芸生複雜的心路歷程。短短幾年，王芸生從「擔憂」到「投降」，再經歷「思想改造」，到「自我批判」。新政權以強大的力量，終使私營媒體臣服於自己的政治宣傳目標。結果，《大公報》之名雖苟延殘喘數十載，但民國年間的《大公報》之實早已消亡，它與其他存續下來的私營報紙一樣，「日漸發展為一份全面服務於黨的宣傳任務的專業黨報了」(頁393)。

李金銓對王芸生的遭遇唏噓不已，他想起了很多民主報人(徐鑄成、蕭乾、儲安平)也都經歷此般曲折，不禁問道：「難道這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頁18)或許是在這個疑問的不斷刺激下，李金銓以蕭乾、陸鏗、劉賓雁三個既有共性，又分屬不同報業範式者的生命史為個案，在歷史「長程」中，試圖「再現記者、報社和時代的關係」(頁448)。李金銓的文字生動流暢，歷史的同情心態盡顯，但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他在涉足新聞史時，並不滿足於「讓材料自己說話」，而是努力想牽出一個「線頭」，理順、理活材料(頁21)。此篇文章末尾，他發揮「社會學的想像」，用「概括性」的語言，嘗試越過三位報人「複雜而具體」的生命，看到更多的光影：權力與言論的力量往往此消彼長，權力強則言論弱，反之亦然；記者只有在適當的時間進入適當的報社，才能充分發揮才華；報社的時代角色，既容許個人的能動性，也界定了這種能動性的極限；在重要

的時代轉捩點上，記者必須選擇不同安身立命的道路(頁449-50)。

李金銓關於權力和言論的判斷，足以燭照近代中國輿論的成長。桑兵教授亦曾指出，晚清民初報刊「民間化」的動力，源自「甲午戰敗以後，新舊矛盾和中外衝突帶來的統治秩序出現過渡性紊亂」^⑥。在本書中，唐小兵博士和章清教授不謀而合，均以「輿論」為切入口，觀察報紙與政治的關係。唐小兵析出一條從「清議」、「輿論」到「宣傳」的線索(頁58)，分別對應報紙未出現時、獲得言論空間後，到再受政治牽絆的過程。章清則更為細緻，條分縷析地將近代報刊扮演「公共」角色的原因，歸結於「國家與社會新型的關係」(頁465)；不過，此中有一個令人費解的「困惑」，即近代中國讀書人所創辦的刊物，愈益顯示出「非政治化」的姿態，為何？帶着這個疑問，章清進一步探詢並指出，報人眼裏的「『公共』，乃是與政治保持若即若離狀態的『公共』；介入其中的讀書人，也主要以關心中國思想學術的前途為己任」。這個反常的現象，「與政治勢力對報章媒介的借重，不無關聯」(頁497、498)。

三 辦報的「活人」：思想的多歧性

張灝曾說，我們討論「五四」時，常「落入民主、科學、民族主義與反傳統主義等觀念的窠臼」，而事實上，五四思想具有複雜的「兩歧性」^⑦。想必，桑兵對此感觸

楊奎松以歷史學家的方式，跨進新聞史之「門」，運用許多第一手檔案，還原了王芸生複雜的心路歷程。短短幾年，王芸生從「擔憂」到「投降」，再經歷「思想改造」，到「自我批判」。

桑兵發現民初「自由」報刊大多是黨派的機關刊物，其自由理念與三民主義大體相同；而非黨派的報刊，也常藉遊戲、風月文字表達思想、言論、出版自由。

深刻，在《報人報國》一書中，他批判將「個人或群體強行納入後來定義、人言人殊的『自由主義』框架」，認為「諸如此類的後認，已經化約了大量具體生動的例外，將不可能重複的史實變成脫離時空聯繫的類像」（頁67、68）。他發現，民初「自由」報刊大多是黨派的機關刊物，其自由理念與三民主義大體相同（頁77）；而非黨派的報刊，也常藉遊戲、風月文字表達思想、言論、出版自由（頁83）。五四以後，思想解放的青年再次辦出許多標名「自由」的刊物（頁71）；而真正使中國普遍嚮往「自由」的，是民族情緒高漲的抗日戰爭，其時「『自由』與『進步』、『世界』、『天地』等觀念相聯繫」，顯示了人們「對國民自由與國家自由關係的重新思考」（頁73）。

許紀霖教授關注五四報刊中豐富的「個人主義」（現代性的重要表徵之一）表達。清末民初，「功利主義代替過去儒家的德性人生觀，開始成為一種新的人生觀」（頁91），到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已將此精神內化，「我」成為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這在《新潮》、《新青年》等刊物中均有體現。許紀霖進一步指出，與晚清「國家主義」盛行時「個人作為國民」的觀念不同，五四報刊中塑造的「自我」，從「國家主義」走向了「新天下主義」：「以理想的人類公理為核心價值的世界主義。」（頁105）

桑兵與許紀霖的歷史敘述，關注時代的思想，而較少出現特定的報人。與之不同，《報人報國》的另外幾個作者則繼續圍繞「人」做文章。高力克教授通過胡適與徐志摩

的「蘇俄之爭」、與蔣廷黻的「民主與獨裁」之爭、與羅隆基的「人權論」及思想分歧，展現中國自由主義知識群體之複雜面貌。高力克還分別給「哥大四傑」的人生貼上「標籤」：「學仕兩棲型知識份子」胡適、「異黨知識份子」羅隆基、「學者型官僚」蔣廷黻、「獨立知識份子」徐志摩，藉以抒發心中的無奈：「在現代中國，唯有疏離政治的自由派詩人才能堅守自由主義原則」；否則，「『中國翻版的自由主義』……往往以偏離自由主義的某些基本原則為代價」（頁141）。

歷史學者對胡適偏愛有加，潘光哲教授繼續以胡適為題，透過他1922年發表於《努力週報》之〈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所引起的陣陣漣漪，試圖還原「192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人群體議論時政的歷史樣態」，以及「各色『論述社群』之間交涉互爭的複雜場景」（頁149）。1920年代，自由主義知識人多持「溫和」主張，在言論市場固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卻與那個時候「以革命為尚」的政治文化衝突，他們的言論遭受群起而攻，自在情理之中。潘光哲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主義群體以「負責任的言論家」自許，其實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人認為他們是可以「裁決是非的上帝」，各色「論述社群」更藉着對他們的批判，「界定自身主張與行動的正當性」（頁175-76）。

與上述諸君不同，唐海江教授以名副其實的報人成舍我為敘述對象。借助歷史學的既有成果，唐海江追溯成舍我辦報理念的思想史根源。1920年代，成舍我的「世界報

系」以平民為讀者對象，在民國報業史上顯得特別異類。此種信念或源於五四時期形成的「世界主義」觀念，即「用輿論這一人道與和平的手段，而非政治運動或革命方式，提高平民的意識，實現大同社會」（頁194）。「九一八事變」後，「民族主義」又逐步影響成舍我的辦報理念，此間，他將民族國家利益巧妙地轉化為公共福祉，1930年代，《立報》所展開的「報紙大眾化運動」（頁204），就是這個思想的結果。唐海江指出，成舍我對自由報刊的想像，很少有二元矛盾與難以逾越的障礙，根源或在於他是一個行動者，具有高度的實用主義傾向，容易雜糅各種思想，達成一種「自適」狀態（頁211）。

四 新聞史的「吸取」與「迴向」

綜觀《報人報國》十數篇「厚重」的論文，「歷史」與「新聞」互相交融，所謂「本體」早已模糊。這並不奇怪，正如齊美爾所說：「自己給自己設置屏障是人類的本能，但這又是靈活的，人們完全可以消除屏障，置身於屏障之外。」^⑩不過，新聞史的「邀請」終有散席之時，新聞學科建制一旦存在，界限就有它的意義，它提示新聞史的立足之處，同時亦告誡這個空間的有限和不足，因而要時刻保持開放的姿態，正如「門」一般，它的「活動性和人們可以隨時走出界限而進入自由天地的可能性，正體現了界限的意義和價值之所在」^⑪。

李金銓在代序中指出：「新聞史的研究不能抱殘守缺，必須從人文和社會科學吸取理論和方法的資源，同時從新聞史迴向給人文與社會科學，保持一個開放互動的態度。」（頁35）即以本書為例，新聞史得到了甚麼？又能回報以何物？

我們暫以「出身定身份」，以來自新聞學門、對新聞史「本體意識」多有強調的黃旦、周葉飛與來自歷史學門的楊奎松兩文為例，說明「新聞」與「歷史」交融的意義。在處理相近的主題時，兩文均涉及「中共黨報模式」的形成；然而，兩文的取向卻有顯著差異。楊文從「具體」的個案入手，以運用第一手史料見長，力圖透過細緻的敘述，讓讀者自行明白中共新聞報刊統治機制的形成，話一說完，其義自現；黃、周一文則從「抽象化」的群體入手，圍繞「身份意識」、「業務操作」、「開門辦報」三個指標，組織史料，處理「新型記者」之主體的重建過程，敘述邏輯清晰。

兩文在本書中前後相接，相得益彰。如果兩文的差異不僅僅是個人興趣所致，而亦受學科氛圍薰陶使然的話，那麼，新聞史能「迴向」歷史學的，也許就是將新聞、報刊、報人、傳播等自身界限內的特殊邏輯，用理論化的語言呈現出來，讓歷史學的細緻入微不至於瑣碎無度；讓歷史學家在觀照報刊、報人時，意識到兩者存在一種特別的邏輯，而難以簡單地化約成與書籍、知識份子一模一樣的東西。

反過來，歷史學對於有限的新聞史來說，則是無限的，它提供的

唐海江指出，成舍我對自由報刊的想像，很少有二元矛盾與難以逾越的障礙，根源或在於他是一個行動者，具有高度的實用主義傾向，容易雜糅各種思想，達成一種「自適」狀態。

本書作者似尤為關注新聞與政治的關係。政治固然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邏輯，「文人論政」固然是中國報人的基本特色，但本書無一篇文章處理新聞和另一邏輯「商業」的抗爭。

第一手史料、鮮活的敘述方式、多歧的思想、複雜的關係與豐富的心靈，向來是以「事業史」立足的中國新聞史之弱點。黃旦曾批判新聞史教材，「不是沒有人，而是沒有活生生的人」^⑩；告誡新聞史要跳脫「編年史」，乃是因為新聞與政治，「是你來我往的一種互動，充滿着人的思想行為、主體意識和難以預料的因素」^⑪；唐海江曾提出「正在構成的新聞史」觀念，即「新聞史是一個由行動者和社會結構相互建構的持續過程」^⑫。這些新聞史學者的自我反思，想必已為本書的歷史研究提供諸多解決範例。本文站在新聞史的立場上評論此書，以「『活人』報報及其歷史書寫」為題，用心亦在此處。

五 「典範」以外的思索

《報人報國》延續了李金銓所編《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一書的風格，作者陣容「豪華」，主題豐富，文筆流暢，實是近年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典範」。但「大樹底下不長草」，「典範」常常有遮蔽的意外效應，讓人遺忘有些不該遺忘的事物。以下並非本書之缺點，而是提請新聞史研究者，能站在本書肩膀之上，看得更遠。

首先，本書以晚清民國為時間起點，但多篇文章的論述重心落在民國以後直到新中國建立，特別是共和國新聞史，而對早期新聞紙和早期報人的歷史研究，仍不盡如人意。作為一種「現代文化形式」^⑬，現代報紙與傳統的「邸報」究竟有何

差別？芮瑪麗 (Mary C. Wright) 所描述的1870年代在晚清官員當中興起的閱讀報紙的文化^⑭，有何現代意義？不同類型的報紙，在清末的政治變革以至辛亥革命中，扮演何種角色？這些問題仍有待探討。

其次，本書作者似尤為關注新聞與政治的關係。政治固然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邏輯，「文人論政」固然是中國報人的基本特色，但本書無一篇文章處理新聞和另一邏輯「商業」的抗爭，或也是一個遺憾。事實上，民國時期，《申報》、《新聞報》、《大公報》等報紙的商業化運作已十分成功，本書附錄中提及的「中國政治經濟如何影響報刊的生存」、「儒家士大夫的『義利之辨』和現代企業精神有無扞格」之類的問題(頁509-11)，想來十分有趣，尚有待挖掘。

最後，本書副標題「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讓人浮想聯翩。如果「文人論政」是「中國現代史的另一種讀法」^⑮，「報人報國」則與之有着基本相近的邏輯。但筆者不禁從「讀法」想到了「寫法」。本書依然是圍繞着報刊、報人等進行的歷史寫作，是對「傳者」的尊重。然而，如果不「另起爐灶」，附錄中有許多重要的提問，如「一般讀者如何解讀報刊內容？」、「主要報刊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有多大？」(頁510)，似難以回答。事實上，本書作者潘光哲另文〈《時務報》和它的讀者〉^⑯、章清另文〈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⑰，提請我們注意將「閱讀史」作為一個新的「寫法」，運用到新聞史的研究中去。

註釋

① 梁啟超：〈本館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載張之華主編：《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公元724年—1995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頁36-46。

② 方漢奇：〈1949年以來大陸的新聞史研究（一）〉，《新聞與寫作》，2007年第1期，頁39。

③ 黃旦：〈五四前後新聞思想的再認識〉，《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頁5-13。

④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插圖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1。

⑤⑧ 黃旦：〈報刊的歷史與歷史的報刊〉，《新聞大學》，2007年第1期，頁51；51-55。

⑥ 李彬：〈「新新聞史」：關於新聞史研究的一點設想〉，《新聞大學》，2007年第1期，頁39。

⑦ 與「本體意識」相關的文章很多，如寧樹藩、曾建雄：〈強化本體意識，探求自身規律——新聞史研究的反思與前瞻〉，《新聞記者》，1998年第9期，頁29-32；吳文虎：〈本體迷失和邊緣越位——試論中國新聞史研究的誤區〉，《新聞大學》，2007年第1期，頁33-38；戴元光、陳鋼：〈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本體意識與範式創新〉，《當代傳播》，2010年第3期，頁4-11。

⑨⑩⑪ 齊美爾(Georg Simmel)著，周涯鴻等譯：《橋與門：齊美爾隨筆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頁4-5；4；8。

⑩ 吳廷俊：〈「政治家辦報」——研究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新聞史的一個關鍵詞〉，《國際新聞界》，2010年第3期，頁14。

⑪ 凱里(James W. Carey)：〈保衛公共新聞事業〉，載格拉瑟(Theodore Glasser)編，鄔晶晶譯：《公共新聞事業的理念》（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頁51。

⑫ Eliot Freidson, *Professionalism: The Third Logi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17.

⑬ 黃旦：〈從「不完全黨報」到「完全黨報」：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再審視〉，載李金銓主編：《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250-80。

⑭ 賀碧霄：〈新聞範式更替：從民間報人到黨的幹部——以上海私營報業改造為中心的考察（1949-1952）〉（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論文，2011）。

⑮ 桑兵：〈清末民初傳播業的民間化與社會變遷〉，《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頁65。

⑯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頁200-201。

⑰ 黃旦：〈由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轉化〉，《新聞大學》，2008年第2期，頁48。

⑱ 黃旦、瞿軼羿：〈從「編年史」思維定勢中走出來——對共和國新聞史的一點想法〉，《國際新聞界》，2010年第3期，頁9。

⑲ 唐海江：〈「正在構成」的新聞史：社會建構論與中國新聞史研究〉，《國際新聞界》，2010年第7期，頁98。

⑳ 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著，劉藝娉譯：《新聞的力量》（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頁34。

㉑ 芮瑪麗(Mary C. Wright)著，房德鄰等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299。

㉒ 李公明：〈文人論政：中國現代史的另一種讀法〉，《時代週報》，2008年12月28日。

㉓ 潘光哲：〈《時務報》和它的讀者〉，《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頁60-83。

㉔ 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頁54-72。